



林禄在福建教育学院就读期间

1978, 高考也许不是唯一的出路

讲述人: 林禄
行政机关

“高考的恢复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,更为中国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。但对于我个人来说,高考也许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”

1978年参加高考的林禄回忆,当时学校办学理念是“贫下中农管理学校”,学校主要是学工学农为主,支农支工成了主课程。1978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,“当时,在我周围从学校、家庭,到考生都没有备考的紧张和氛围。”让林禄记忆犹新的是,在高考的前一个月学校还安排学农基地劳动,“当时我才15岁,从学校的化粪池里捞出的粪便装到桶里,两人一上一下,抬到学校后山的一个学农基地上去给农作物施肥。山路坡非常陡,小个子在前面的话,重物压得肩膀就会受不了,所以我在后面的位置。”林禄说,“我的嘴差点就碰到了那个桶的边缘,桶里液体来回荡漾,一不小心就溅到脸上和身上。这就是我关于高考前的回忆。”

“也许是因为那时我才15岁,对于高考毫无概念,一点紧张感都没有。考场设在城关一所实验小学。记得很清楚,进考场坐下后,每张考卷上都压着一块石头,怕试卷被风吹走,当时我不知道石头是拿来干吗的,还拿着这块石头在桌上敲打。”林禄所在的学校是乡镇里唯一一所中学,那年参加高考的二十几位同学没有一个考上。

复读重考? 对当时的林禄家庭来说无疑是件奢侈的事。个子又小农活干不了,怎么办呢?“我二哥承包了生产队养牛活,二哥没空时就叫我去放牛,一次骑在牛背上摔下来左手骨折了,母亲见状实在心疼,通过亲戚关系找到了学区校长去当了代课教师,后转为正式民办教师,就这样教了四年的书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,中等师范向民办教师招生,我就买了教材回家自学,教书备课的剩余时间就全部拿来复习考试,如愿考上了中等师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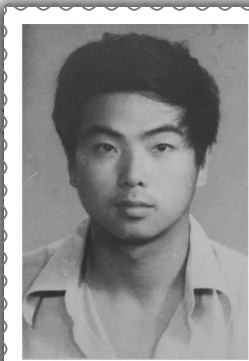
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小学任教,林禄由于各科成绩优异,被分配到县级一所中学任教。“教中学,文凭至少要是大专或本科,由于文凭不达标,我又继续边教学边自学考上了福建教育学院。从学校毕业,又在教育岗位认真工作,被一个领导看中,改行到政府部门。”林禄现在是在政府相关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。

N海都记者 林星宇

当不休的蝉鸣响起,当沉闷的雨季抵挡不住炙热的青春,记忆深处那段关于“高考”的回忆又被逐渐唤醒。

焦虑与平静,迷茫与坚定,在这些日子里反复交织。或喜悦、或遗憾、或感动、或懵懂……

千千万万个渺小的“你我”构成了一代人关于高考的回忆,就让我们一起阅读这些“小人物”的故事,一起回忆那个夏季“你我”热烈赤诚的青春吧!



郭教授大学时期的照片

1979, 那时候很多同学年纪挺大

讲述人: 郭先生
退休教授

1979年参加高考人数468.5万,录取人数28.4万,“据说那年的高考卷子很难,文科录取线比前一年降了30分,那时我从报纸上看到,当年的录取率只有6.1%。”郭教授回忆道。

“知识改变命运”这句话,郭教授深有体会。“高考对于我这样的农家子弟,无疑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,尽管高考是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’,但一旦考上,平台、见识都将会发生质的飞跃。那时我很幸运,当时国家急需人才,所以我们都有机会进入相对应的领域施展才能,为国家作贡献。”

当突破千军万马,终于有机会重返校园时,学生们如饥似渴。“考上福建师范大学后,我感觉到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都非常浓厚,学校的图书馆每天都是人满为患,下课吃了晚饭大家都赶着去图书馆占座学习,晚了就没有位置了,可谓是‘一位难求’。福州的夏天是很闷热的,当时的条件不如现在,图书馆的自习室里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吊扇,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,当时的大家对于知识渴求没有分毫的减弱。”

郭教授回想当年,“考上师大的同学年龄差距都很大,我们中文系79级202个学生,60后只有70多个,剩下的都是1960年以前出生的。”

“印象比较深的是宿舍楼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,总有一个小年轻来找他,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他俩是同乡,后来才知道是父子。那个时候的人生孩子早,爸爸是‘老三届’,儿子则是‘应届高中毕业生’,这也成为我当年高考的一个特殊的记忆。”

高考记忆



吴作员参加工作第一年

1992, 高考路上遇见一辈子的恩师

讲述人: 吴作员
中铁十九局

谈起高考的回忆,吴作员笑着道:“第一年,我没考上,所以我第二年复读重考,那时很喜欢打乒乓球,甚至和同学逃课去打球,有一次逃课被副校长发现了,副校长来到乒乓球馆,没有指责我们,只是默默地卸掉了乒乓球网。当时我很不乐意,也是玩得正在兴头上,觉得副校长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,就顶撞副校长,甚至还侮辱他秃顶,‘同样都是头发,为什么你的就比别人少几根?’”说到这,吴作员的眼神变得严肃了许多,“现在想来,实在是不应该,一个出生在教育世家的孩子,竟对老师如此不尊重。”

既逃课又顶撞副校长这件事学校没有处分吴作员,甚至老师都没提起过这件事,“从那以后我发现‘老师’在我心里的分量变得很不一样,他不跟我计较,体谅我,老师怎么能这么大度,哪怕是在班上批评两句,我也能把这个事情‘卸’掉了,从那以后,我就下决心,一定好好读书,一定要考上大学。”自那之后,吴作员再没逃过课,把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,经过努力最终考上了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。

“当时考上大学的同学相对较少,如果考上了,家里就会请酒席,那时不叫‘谢师宴’,叫做‘升学宴’。同班其他同学请老师到家里吃饭,借着那个机会,我和副校长喝酒道歉,他说,‘我理解你,知道你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,但你是学生,我是老师,一日为师终身为父,我怎么可能跟你计较呢,每个学生都像是老师的孩子,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健康成长。’听完副校长的一番话,我深深地被触动、感动了,才把这个‘心结’打开,自那之后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”



刘昂回高中母校宣讲东北大学

2015, 爸妈给我买了个“高考吉祥物”

讲述人: 刘昂
北京大学研究生在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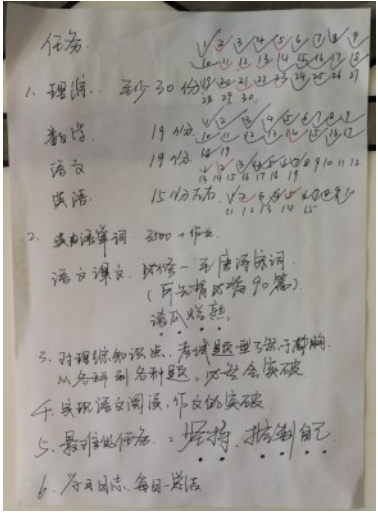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千禧一代,“高考”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,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攀高,高考,不仅承载着高三学子的梦想,背后更有父母的期待,家有考生,意味着全家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。

“高三学习的节奏很紧凑,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,可能大家放松的方式就是玩玩手机、听听歌。我妈可能也是担心我空闲时间玩手机沉迷游戏耽误了学习,就出奇招,和我的好朋友韩一鸣的妈妈商量着给我俩买只小宠物,一方面可以避免我俩玩手机耽误学习,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陪伴,让我们不那么孤单和无聊。”

“记得某一天放学回家,我一进门就看到沙发上‘瑟瑟发抖’的‘棒棒’。”刘昂的爷爷奶奶给小泰迪取名叫“棒棒”,“一家人就这么叫着,随时随地进行‘祈福’——‘高考成绩棒棒的’。”刘昂笑着道。

刘昂的高三生活因为这只“高考吉祥物”而变得没那么枯燥。“学累了就喊‘棒棒’。它就会飞奔过来,把它抱到腿上摸摸头,教它‘学习’。另外,它每天都会送我出门,等我回家,有这么一个伙伴陪着,有种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。”

谈到高三的学习生活,刘昂表示,在高二的那个暑假,他就提前开始了高三复习计划,“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‘理综至少模拟考30次、语数英至少模拟考15次’,很感谢那时的自己,计划都按时完成了,所以回校后的第一次考试,考了年段前十。”当时高考压力很大,周围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一两点睡觉,刘昂认为保证充足的睡眠,是好成绩的前提,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尽可能地保证12点前睡觉。“在学习方法上,我更倾向于整理错题原因和做题思路,而不是单纯地把题目记下来,集成一本‘错题本’。”



刘昂高二暑假的学习计划